

GUODALIE
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郭大烈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郭大烈◇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郭大烈◇著

GUODALI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郭大烈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大烈纳西学论集/郭大烈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8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7-105-08467-8

I. 郭… II. 郭…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K28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31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7-105-08467-8/C·241 (汉 21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厓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厓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厓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铨、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从学自述

—

我于1941年7月26日出生在丽江市古城区宏文村一个纳西族农民家庭，1959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下同）历史系，学制5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历史专业基础知识，主要着重学习中国少数民族史志及民族学理论，曾听过翦伯赞、翁独健、吴晗、林耀华等名家学术讲座，还曾到北京郊区回族村镇和四川阿坝州藏族地区实习，注意学习和收集纳西族资料，曾手抄方国瑜教授《麽些民族考》。

1964年毕业后，我被分到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从事文教工作，先后参加宣传“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但从未放弃专业研究。比较注意回、彝、苗、傈僳族村寨调查，以及文物碑刻和文献的收集，曾编写过《新编禄丰县志》（内印稿）和《恐龙之乡——禄丰风物录》等书。

1980年，我考入刚组建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先后任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先后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称，并先后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和民族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会长等十多个职

务，曾到过云南各个民族地区以及川、黔、桂、吉、海南、甘、青、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进行民族调查，并到过加拿大、日本、泰国、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考察，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重点项目和省社科院多个课题。

26年来，我主要从事民族学和民族发展问题研究，而重点是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

二

我的专业研究学术领域和工作分述如下：

（一）纳西族研究

1. 注重基础性研究，收集整理了纳西族资料、目录（索引）以及编辑出版了各种文集。

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和大量的文献检索工作，撰写和编辑了《纳西族史》（合作）、《纳西族文化史》、《纳西族文化大观》、《东巴文化论集》、《东巴文化论》、《纳西族研究论文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文化强县理性思考》、《中国民族人口·纳西族人口》、《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纳西族》、《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纳西族民族文学》、《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2、3辑）等13部（种）共400多万字。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时，先对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十分感兴趣，后又购买了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我国文献一目了然。目录学和索引乃是学术入门的钥匙，这个工作是苦一人利百人的好事。故，我曾参编或主编了大量供他人检索的纳西族研究书目和资料索引，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提要·纳西族卷》、《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纳西族研究资料索引》等，同时在《纳西族史》、《东巴文化论集》等书后面都

附有相关索引，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如《纳西研究资料索引》是1983年印的油印本，主要供《纳西族文学史》编委会使用。他们认为该书极大地便利了搜集资料工作，省社科院、云南大学以及四川学者纷纷索要，200册迅速送完。

2. 为了承先启后，彰显前辈业绩，为整理出版纳西族前辈遗著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纳西文化工作能有今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有责任承先启后。

方国瑜教授是“南中泰斗”，我曾评述介绍其巨著《纳西象形文字谱》，还写了1985年在丽江为其立的墓志铭。另外，协助整理出版了周汝诚先生的《纳西族历史编年》、《永宁见闻录》等著作。

我参与了洛克的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编校工作，该书于在1999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李霖灿一生研究纳西东巴文化，不幸于1999年6月29日在加拿大去世。后来8月26日我在昆明，立持召开了缅怀李霖灿及纳西族前辈座谈会，并策划出版和编校了其著作《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参与了《出版缘起》的写作，评价了李霖灿对东巴文化的贡献。

2003年，我参与和编校了周善甫遗著《大道之行》及纪念文集《风雅儒者》，并参与主持召开“纪念文化名人周善甫先生及其学术讨论会”，又于2004年2月2日在丽江召开了座谈会，发表了论文《〈大道之行〉对国学的探索》。

和万宝先生是纳西族的智者，1996年6月15日去世，留下了21本笔记。我通过多年整理，并筹集经费，于2004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守住精神家园——纳西文化笔记》，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我写了序言《一位智者的选择：论语+东巴文化+电脑+共产党宣言》，并于2005年2月21日在丽江召开出版座谈会。

李群杰前辈是“云南的潘汉年”，后人应为其高风亮节、学者风范、丹心古风树碑立传。经过多年曲折，2002年我请著名历史学家谢本书撰写并出版了《枫叶如丹——李群杰生平概述》，并召开了庆祝李老九十华诞及该书出版座谈会。我应李老之请，为该书写了序。还曾在2001年《李群杰文集》座谈会上以李老人格魅力为题发了言。

3. 主撰《纳西族史》，力图厘清纳西族发展的历史线索，“构建了更为完整、系统的历史体系，把从远古时期至近现代的纳西族形成和发展历史，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史金波）。

早在1962年，我曾朝夕披览方老《麽些民族考》，立下步方老后尘治族史志向，但毕业后运动迭起，直到1980年才进入云南社科院历史所，与方老同院居住，早晚请教，广泛收集资料。1984年，参加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恰遇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李峰铭先生约我与和志武老师撰《纳西族史》。该书列为云南省社科院“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到1994年出版耗费了十年心血。专家评审鉴定认为：“《纳西族史》全稿约50万字，是近几年纳西族研究的重点成果，在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纳西族简史》和早年方国瑜先生《麽些民族考》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进了一步。”《纳西族简史》原主编王宏道教授认为：“该书无论从体例结构、内容分量，还是学术价值，都比简史大大前进了一步。”

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1996年，丽江县文化局作出在全县文化系统职工认真学习该书的决定。它于1994年初版2500册，1999年经修订再版。1996年，该书获云南省政府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我认为，《纳西族史》还需修改、补充，再出第三版。

4. 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足迹中，以及古今中外民族兴衰比较研究中，对纳西族一些文化

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探索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

我曾深思纳西族为什么能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夹缝中，在周围强大的民族夹缝中生存延续？纳西族文化为什么能在外来强势文化千百年的冲击下并未失去自己文化的核心特征？

受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听过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讲课、1963年读到他写的《内蒙古访古》。

及后来读本尼迪克研究日本文化模式的《菊花与刀》，启发，我提出以下一些观点：

(1) 独特的纳西族心理素质及其变更因素：①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意识；②内向性和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③向上进取心和热衷于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④深沉谨慎、质朴厚重的性格和为人；⑤兼收并蓄和信而不笃的宗教观。当然，心理素质是其共同文化的表现，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但受地域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地域和时代变异。

(2) 纳西族处理各种关系的独特的文化模式：①亲近大自然，善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大自然视为人类同父异母的兄弟；②和合共居，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和才能生存；③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与周围民族友好通婚；④历史上积极搞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并接受封赏和统治；⑤顺应历史潮流，社会转型快。

(3) 纳西文化本质特征：①热衷于学习汉民族等的先进文化，同时坚守自己的古老的文化传统；②接受主流意识，但有相对传统的影响民族社会行为的心理素质；③思想开放，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信而不笃的态度；④逐步建立了本民族的中心城市——丽江古城，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场；⑤在处理本民族和外来文化关系上，吸收融合，重组新的文化系统。

(4) 独特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纳西族文化体系，它包括：由价值观、文化精神、心理素质等构成的民族文化观念层；由语言文

字、经济生活、文化发展、民族共存共荣等构成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层；由文化传统、道德、行为构成的民族行为文化层。

(5) 纳西族在许多相关文化圈交接点上的特殊地位：纳西族在历史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起到了特殊作用。唐代，纳西族地区是吐蕃、南诏和唐王朝逐鹿之地，到明代又是藏传佛教南传、内地汉传佛教北传的交汇地。两者都到丽江为止。近代，它又是连接滇藏文化的茶马古道的纽带。从宗教学来讲，东巴教正处于自发多神教向人为一神教过渡中；从文字学来说，东巴字正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转变之中；从语言学来说，纳西语正处在羌语支与彝语支分界点上。

(6)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纳西族三种文化类型的划分：一是以香格里拉县三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导型：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宗教上笃信东巴教；婚姻上确立一夫一妻制，但婚前的社交自由，生活古朴，死后火化。二是以永宁为代表的吸收变迁型：受藏传佛教影响大；保留走婚制，但以前土司的家庭又是娶妻生子。当前，由于旅游的发展，其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以丽江为代表的开放容纳型：从明代以来，木氏土司采取开放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包容态度，但各种宗教均不能主宰当地纳西族的思想 and 行为方式；吸收外来文化，但又未失去本民族文化特征，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便是其文化成功延续的范例。

5. 为增强纳西语和东巴文化的活力，在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小学做试点传承民族文化。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发出了预警信号：“尽管目前世界上仍存在大约 6000 种语言，但其中的许多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对这些语言进行记录，制订新的主动型政策，以及采取新的措施来增强这些语言的活力，已是当务之急。”

鉴于丽江古城纳西族小学生有 70% 已失去了母语，如白龙潭小学 570 个纳西族学生，只有 110 人还会说母语，仅占 19%，纳西族先后用象形文——东巴字书写了上千卷古籍，现已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但现在会释读这些古籍的人已寥若晨星，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研究传承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1) 曾先后到滇、川、藏交界纳西族地区调查东巴教和东巴现状，写出《东巴教的派和现状》，为人们介绍东巴教现实生存状况。

(2) 先后编辑《东巴文化论集》和《东巴文论》分别于 1985、1991 年出版，并重印多次，广泛宣传东巴文化内涵及其学术价值、东巴文化构成层次等。

(3) 积极协助召开东巴达巴座谈会（1983 年），丽江首届、第二届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会（1999、2003 年），并参与会议前期筹备，编论文提要、会后编文集工作。

(4) 从 1999 年开始在黄山小学办东巴文化教学试点班，先后有三批学生毕业，编写了《纳西谚语》、《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等教材。为搞好这些工作，创办了东巴文化传习院。

通过 5 年努力，这些工作得到了丽江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认可。2003 年 1 月，原丽江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在全县推广学习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工作。从此，原大研镇 16 个小学和其他乡镇已开设了有关课程。

（二）民族问题和民族学研究

除纳西族研究外，我也积极从事有关民族学及民族问题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从世界范围的广度、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度和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主编了《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探索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分裂为许多民族国家，诚如法国学者所言，导致是“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的结果。中东、南亚地区也是民族纷争乃至流血冲突不断。民族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民族问题仍然存在。为此，我们申报了社科基金课题，深入到全国主要民族地区调研、查考文献，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问题的由来，以及当前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和人口生态、教育、传统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特别强调了民族表层文化淡化的同时，民族意识增强是社会初级阶段面临的全新的民族问题，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和冲突将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并形成持续的文化震荡等特点，提出了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这个成果，被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文精认为对当代我国民族问题“作了很好的探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这是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2. 在编写综合性、普及性中国或云南民族史志的同时，对民族社会发展一些专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20多年来，先后合著《云南省志·民族志》、《云南少数民族》（修订本）、《云南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中华民族知识通览》、《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概论》等知识性或综合性图书，介绍了中国各民族的今日状况和文化。同时，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如对商品经济与民族发展也作出多角度研究，发表过《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生产发展类型及其标准》。就民族教育、民族文化问题，也写出《走出双向流失沼泽，实现民族教育决策观的转

变》、《民族文化类型及其现代化调适》、《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研究文章。

最近几年，还写过《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毛泽东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从“真正民族平等”到“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在《民族区域自治》颁布实施 2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自己对自治法和民族问题的看法。

3. 对民族学科建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民族学会上和《云南社会科学》、《民族学研究》上发表过《世纪之交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我国民族学“本土化”及其未来》等文章。

在 1997 年撰写的《世纪之交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探索了 20 世纪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的坎坷历程，分析了 21 世纪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学面临的课题，并提出中国民族学的前途系于社会学术环境的造就、社会对它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任重而道远，中国的民族学应从自己的特征出发，抓好学科建设是本位——“回到民族学”的具体建议，相信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在 21 世纪会大大提高，并将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门基础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该文得到了中国民族学会秘书长何星亮博士的肯定。

4. 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提出了各民族应加强文化自觉性、要认真对待文化选择问题。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 1997 年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文化自觉”是时代的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应有“自知之明”，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回应外来文化，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